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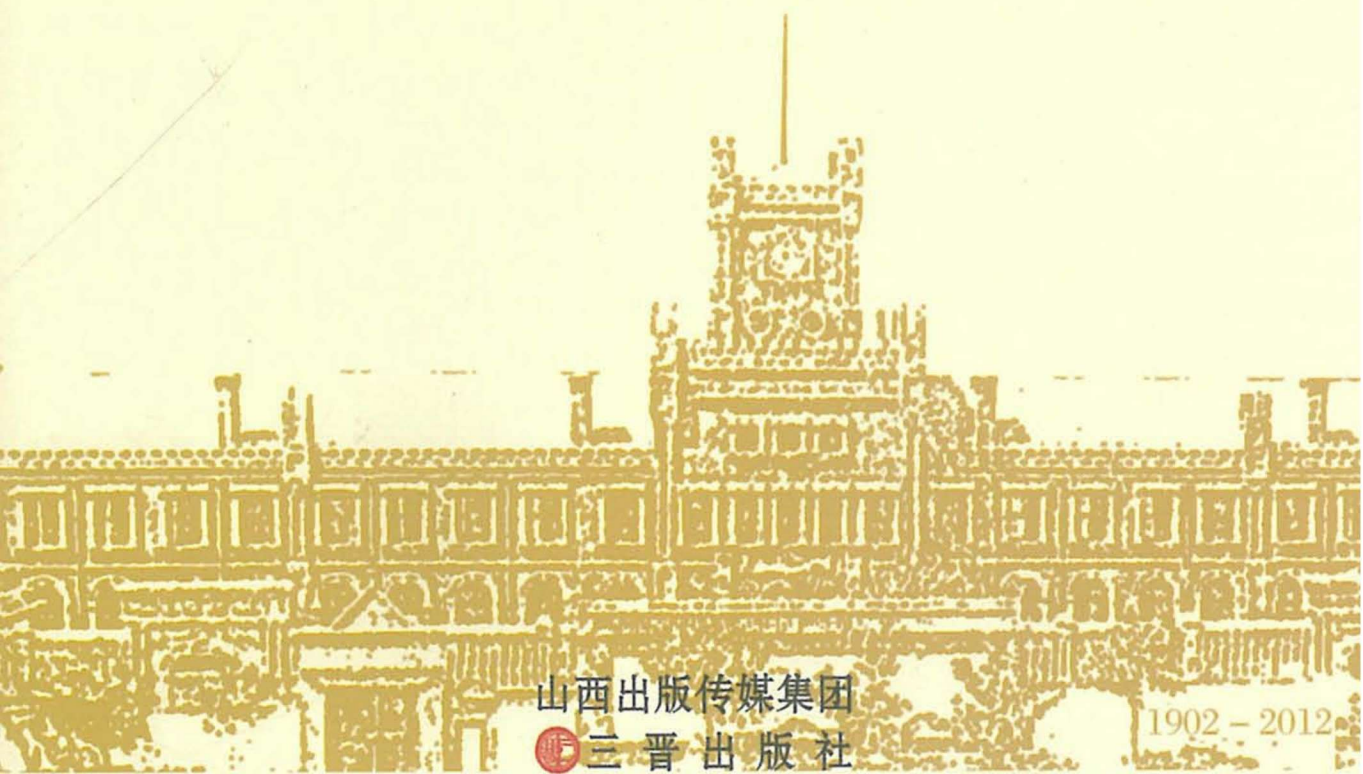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山西大学图书馆史

SHANXIDAXUE TUSHUGUAN SHI

李嘉琳 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1902 - 20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大学图书馆史 \ 李嘉琳主编 . 太原市：
三晋出版社 . 2012. 04
ISBN 978-7-5457-0517-1

山西大学图书馆史
李嘉琳 主编

【作 者】李嘉琳主编

【出版发行】太原市：三晋出版社，2012. 04

【ISBN号】978-7-5457-0517-1

【原书定价】73. 00

【中图法分类号】G259. 256（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 信息与知识传播 > 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 > 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 > 中国 > 各类型图书馆）

【参考文献格式】李嘉琳主编．山西大学图书馆史．太原市：三晋出版社，2012. 04.

序言

2012年5月8日，山西大学将迎来110年校庆。为了隆重纪念母校110年华诞，系统展现近年来山西大学创造的优秀学术成果，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

山西大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代，在“西学东渐，革故鼎新”中应运而生，开创了近代山西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百年沧桑，历史巨变，山西大学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学术实践，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办学业绩。百年校庆以来，学校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创新，实现了新的跨越和腾飞，逐步成长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的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研究型大学，谱写了兴学育人的崭新篇章，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大学因学术而兴，因文化而繁荣。山西大学素有“中西会通”的文化传统，始终流淌着“求真至善”的学术血脉。不论是草创之初的中西两斋，还是新时期的多学科并行交融，无不展现着山大人特有的文化风格和学术气派。今天，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正是传承山大百年文脉，弘扬不朽学术精神的身体力行之举。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的编撰由科技处、社科处组织，将我校近10年来的优秀科研成果辑以成书，予以出版。我们相信，《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对于继承与发扬山西大学学术精神，对于深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对于促进山西高校的学术繁荣，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谨以此丛书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山大母校，祝愿母校在新的征程中继往开来，永续鸿猷。

2011年11月10日

前言

伴随着山西大学沉沉的脚步，山西大学图书馆也走过了它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一百多年来，山西大学图书馆，从创办到不断的发展，期间经历了战火的洗礼，时事的动荡，时代的变迁和发展的辉煌。图书馆从“藏书楼”到“窑洞馆”发展到今天 3.5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的图书大楼；藏书从几千册发展到今天的 290 多万册；工作人员从 1、2 个人发展到今天的 80 余人；管理方式从手工操作发展到今天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馆藏从单纯的纸介质收藏发展到今天的光盘、电子、网络数据库等。前进中的山西大学图书馆正朝着数字化、开放型的图书馆迈进。

我们不会忘记，图书馆今日的辉煌是建立在百年来前辈们艰难创业，不懈奋斗的基础之上的，其中也有各历史时期的社会贤达对图书馆的热心赞助和支持。今天我们编辑出版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以此敬献给他们，敬献给默默奉献于图书馆事业的全体馆员们。他们勤恳、务实、敬业、奉献的精神将激励我们不断开拓创新，团结奋进，为建设新的、现代化的图书馆而努力奋斗！

我们也深知，山西大学图书馆与全国的许多图书馆相比，无论是资源、人才、管理，还是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把自己的努力与不足都展现出来，一方面就教于各位同仁，一方面提供一些可兹借鉴的经验或教训。在此恭请各位不吝赐教。

本书的编辑得到了许多老馆长、老馆员的热情支持与帮助。例如：王振华馆长、郭学勤书记、卫庆怀副馆长、马雪鹤老师等都认真地写出了回忆文章，一些老同志也采取口头讲述的方式将自己所了解的图书馆历史一一细细道来，这里需要特别感谢的是薛愈老先生(1912—1998)，他毕生从事图书馆工作，从 1946 年起在山西大学图书馆工作直至退休。薛老先生不仅一生工作兢兢业业，而且随手将所经历的图书馆发展、变化记录下来，从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薛老退休前将自己保存多年的资料系数留给了接任的馆员，我们这本书中有一些资料即取自于薛老所留资料。在此一并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全书由编写组成员共同完成。第一章 1.8 万余字，由王欣欣负责撰写初稿；第三章第三节由郝运负责撰写初稿 0.5 万余字；张梅秀进行了正文部分第一稿的补充撰写共 5 万余字；高维新提供了“大事记”的部分内容；魏爱华负责 1902—1949 年部分的材料以及馆长名录的搜集整理。照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为李辉敏摄影，李明廷进行了照片的处理。附录部分还收集了图书馆职工发表在各种刊物上（以及未曾发表的）的，有关图书馆的人和事的文章，作为本书的补充。李嘉琳负责全书的编纂和统稿。

因编辑时间仓促，资料有限，且编者才疏学浅，书中疏漏、错谬之处在所难免，不妥之处，恳请校友和读者指正。

李嘉琳

2011 年 12 月于山西大学图书馆

目 录

第一章 初创十年（1902—1911）\1

第一节 山西大学堂的创立（1901—1903）\1

第二节 藏书楼的诞生（1902—1911）\5

第二章 民国时期（1912—1948）\9

第一节 民国初期缓步发展（1912—1930）\9

第二节 动荡年代跬步前行（1931—1938）\11

第三节 战火之中艰难生存（1939—1945）\14

第四节 三年内战颠沛流离（1946—1948）\21

第三章 新中国时期（1949—1976）\30

第一节 迎来解放获得新生（1949—1953）\30

第二节 建国初期健康发展（1954—1957）\43

第三节 教育革命有分有合（1958—1965）\48

第四节 “文化革命”十年动乱（1966—1976）\60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1977—1991）\66

第一节 拨乱反正步入正轨（1977—1981）\66

第二节 改革开放快速发展（1982—1991）\69

第五章 现代化发展时期（1992—2000）\82

第一节 改善环境夯实基础（1992—1996）\82

第二节 全面建设强化服务（1997—1999）\90

第三节 与时俱进走向现代（2000）\96

第六章 走进新世纪（2001—2011）\101

第一节 新的世纪新的征程（2001—2002）\101

第二节 开拓进取自强不息（2003—2011）\103

附录一 图书馆大事记\124

附录二 图书馆科研成果\171

附录三 图书馆所获各种荣誉\194

附录四 图书馆记忆\195

参考文献\247

第一章 初创十年（1902—1911）

第一节 山西大学堂的创立（1901—1903）

一、山西大学堂的源起

山西大学是中国建校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也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西大学的前身山西大学堂创建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是引进西方大学教育的产物，更是清末推行“新政”期间改革传统书院、创新办学模式的结果。山西大学堂，最初就是由此前设在太原的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合并而成的。

晋阳书院，明嘉靖九年（1530年），由山西按察司副使陈讲倡议，在侯家巷辟建院舍，开办了书院，内建“三贤堂”，祀奉着讲学河汾、生长于河汾的三位先贤大儒王通、司马光和薛瑄，以为士子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名曰河汾书院。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奉诏罢毁天下书院，河汾书院也即行停办。万历二十一年（1593），时任山西巡抚魏允贞将河汾书院三贤堂移建于右所街，避其书院名，改名为三立祠，取“立德、立功、立言”之意，此即为惯称的“三立书院”。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矫诏尽毁天下书院，三立书院又被废止。崇祯七年（1634）巡抚吴牲、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从考生中择录优等生250人进入三立书院，并将三立祠名臣、乡贤增至71人。崇祯十六年（1643）巡抚蔡懋德对三立书院进行了修葺并整顿，聘知州魏权中、举人韩霖、桑拱阳、傅山等来院讲学，学术研究与理学之风更加兴盛。崇祯十六年二月初八（1643），李自成军攻入太原城，巡抚蔡懋德入三立祠自缢。

明清之际，由于战乱，三立书院的师生大都逃匿，书院颓废不可收拾。清顺治十七年（1660），巡抚白如梅鉴于三立祠地势湫隘，又经兵燹，遂在府城东南侯家巷即原河汾书院故址，购地重建院舍百余间，“书院成，而以三立颜之”，名是原有的，房是新建的。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令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并拨银千两为营建费用。三立祠经省抚奏准，改为晋阳书院。乾隆十八年（1753），巡抚胡宝瑔购得学院东面的（今太原师范学院北区）开阔空地，新盖讲堂、书舍，并新建祠堂，祀祭前明殉节巡抚蔡懋德，以同时殉难诸臣从祀。乾隆二十九年（1764），巡抚和其衷辟讲堂东之隙地建学舍40间，添建奎星阁于中央。嘉庆七年（1802），书院肄业生童暨绅士捐资重修奎星阁，布政使姚祖同捐资重修左右牌楼，监院稟请上司筹款随时补葺各处房屋，院舍建筑设施逐步完备。直到清末，在300多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晋阳书院虽几经起落，仍维持到清末改为学堂，晋阳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即为1902年山西大学堂成立后的首任总教习兼中学专斋总理谷如墉，晋阳书院的学生也全数转入山西大学堂，成为新学堂的首届新生。

令德堂书院，清光绪八年（1882），张之洞继任山西巡抚，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的情况，奏准朝廷，札饬冀宁道筹建一所书院，“以为考课诸生经史古学之所。”光绪十年四月，因“原设桥头街屋宇湫隘，不足以萃集图书，栖息群

彦”，选定太原府署之北宝贤堂旧址（今实验中学东侧）修建，至光绪十一年（1885）全部院舍建成，经费由省厘金项下支付。张之洞亲自聘请晋阳书院山长王轩兼任书院主讲，另外聘请张于铸、杨笃、杨深秀等为协理。这位封疆大吏不仅亲选宝地，亲选教习，还亲自为这所新式学府命名“令德堂书院”。令，为有美好之意，其寓意院中弟子，应有美好品德。张之洞又飭冀宁道详议《令德堂章程》共六条四十二目（载《晋政辑要》卷二十三《礼制学校六》）“所有延请主讲、编立功课、修缮杂支、书籍购置、课卷日记、定式刊印、监院教谕、书役斋夫、巡更杂役之责，均一一设立章程”，“以期历久可行”。开始时，课程设经史、考据、词章等科目，逐渐地一些全新的算学、地理、天文学等西式课程增进了令德堂书院的课堂。光绪二十三年（1897）“百日维新”期间，院长屠守仁进行教学改制，添设政治时务、农工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等课程，当时的山西巡抚胡聘之奏准将令德堂改为山西省会学堂，书院山长改称学堂总教习，按《京师大学堂章程》实行中西并课。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毓贤任山西巡抚时，酿成了山西严重的教案。令德堂被外籍传教士趁机强占，校舍变成临时教堂，令德堂被迫停办。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开始举办“新政”，八月初二，下诏：“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光绪朝东华录》卷 169），晋抚岑春煊闻风而动，拟将令德堂与晋阳书院撤销，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并选任姚文栋为督办，谷如墉为总理，高增为总教习，段雨田为教务长，着手拟定《大学堂规则》《考校章程》《奏定章程》《选举章程》等上报朝廷，待核准后实施。同时还延聘贾耕、田应璜、胡瀛、成连增、常麟书等各科教习，准备开办山西大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岑春煊拟定《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就“筹经费、建学舍、选生徒、定课程、议选举、习礼法”共六条详细陈奏。其中第二条“建学舍”云：“省城旧有晋阳、令德两书院，令德逼近衙署，局势狭；晋阳在城东南隅，旁多隙地，现已就晋阳基址，派员详加勘估需用工料银两，就地实无从筹划，应请恩准作正开销。惟学堂工竣需时，刻下所调各属生徒陆续至省，未便令其久候，拟先借贡院略加修葺，即于四月初一开办。俟学堂落成，再令迁入。”光绪帝硃批曰：“选举一条，著管学大臣议奏，余著照所拟办理。”（《清实录德宗实录》卷 498）如此，在新校建设之前，选定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为临时校址，“略加修葺”，于四月初一（5月8日）大学堂正式开学了。至此，在改造两个传统书院基础上新建的山西大学堂正式宣告成立，其标志着清末书院改学堂的变革在山西取得重大进展，从而为山西大学堂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山西大学堂的建立

由书院改制而创设的山西大学堂奠定了山西大学堂发展的基础，同时发生的“山西教案”及“庚子赔款”事件，则促成了山西大学堂中斋和西斋的形成，加速了山西大学堂的发展。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晋省在巡抚毓贤的影响下，仇教排外情绪高涨，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山西教案”，导致“联军压境，全省岌岌”的

局势。天主教乘机强占了令德堂作为教堂，并向新任巡抚岑春煊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还勒索白银 225 万两。危局之下，清廷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向清政府建议，电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出面斡旋，解决“山西教案”问题。翌年春，晋抚岑春煊与冀宁道沈敦和商议后，致电李氏“来晋任委员之职，负责解决晋省教案与商务问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1 年 5 月 14 日），李提摩太应李鸿章及岑春煊之请，由沪抵京，并与寿阳教会叶守真、公理会文阿德代表耶稣教山西教会拜见李鸿章，并递交《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皇朝经世文编续集）》其中第三条为：“共罚晋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期。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俾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也就是说李提摩太拟将晋省赔款的五十万两银子就地办一所大学堂。李鸿章对此表示赞同。并将开办大学堂的诸事交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同时，电告山西巡抚岑春煊遵照办理。由于娘子关一带局势尚未平静，李提摩太未能直接到并商谈，随转道返回上海。7 月初，耶稣教各教会推出教士叶守真、敦崇礼、文阿德等 8 人为代表到太原与山西巡抚商讨实施办法。岑春煊以山西民穷财尽为由，对付银 50 万两开办大学堂事表示异议，未与定议。后经李提摩太从上海“叠次催促，函电往返”，岑春煊遂于 9 月派洋务局候补知县周之骧赴沪与李面谈。周之骧对开办大学堂事宜提出四个条件：晋省出 50 万两银子不称罚款；西籍教师在校内不得宣传耶稣教；学堂不得与教会发生关系；西籍教师不得干预学校行政。李提摩太则坚持西人应主持校务，并以东南各省教会学校并无此等限制坚持己见，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经过反复磋商，至 11 月份周之骧将与李提摩太议定《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电呈岑春煊，其主要内容是：山西筹银 50 万两，分期交付李提摩太，开办中西大学堂。十年以内，学堂课程及延聘教习、考选学生，均由李主持；十年期满，学堂房屋及一切书籍仪器，概交晋省，并不估价；学堂延请总管及大教习中、西各一人；学堂即名中西大学堂；此中西大学堂与晋省大学堂并京师各省大学堂一样看待，学生也一样录用。岑春煊认为，合同中有关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等项，“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主权”，一再电飭周之骧极力磋磨，李提摩太则“持之甚坚”。考虑到辛丑和议甫定，时局尚未大定，山西又是义和团运动期间“教案极巨”之省份，若谈判决裂，恐致奖励为难，岑春煊与山西官绅多次筹商，最后“委曲求全，固与议定”。这件事无疑成了岑氏加速改造书院，抢先筹建大学堂的直接动因。

合同签署后，岑春煊于 12 月依照合同交付李提摩太大学堂经费 10 万两，李提摩太即在上海聘请教习，购买仪器设备，开始为中西大学堂开学做准备。1902 年，清政府下诏废书院，改学堂。本不愿意让西人操纵山西教育的岑春煊于 5 月 8 日，抢在中西大学堂前头创建了山西大学堂，在临时校址开学。

1902 年 4 月初，李提摩太及敦崇礼夫妇（敦崇礼 MoirDuncan 苏格兰人，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汉语及中国经史，曾任山西大学堂西斋首任总教习）、新常富（原名尼斯特乐姆 Nystrom，瑞典人，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等被聘用的中西大学堂

中外教习一行数人，由上海出发，辗转一个月于4月30日抵达太原，准备按上年签订的合同筹备中西大学堂的开学事宜。得知山西已成立大学堂，颇感意外，甚至抱怨山西当局“保守”、“狡猾”。于是李提摩太便与岑春煊协商将中西大学堂与已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合并办理：一部专教中学，由华人负责；一部专教西学，由他自己主持，并将其拟改合同底稿提交巡抚考虑。岑春煊认为两校合并，“事关创举，未敢率允”，即飭署布政使吴廷斌、署按察使胡湘林、署冀宁道沈敦和，会同大学堂总理、在籍户部主事谷如墉暨省城绅士筹议，商讨归并办理有无流弊，并就外人所提交之拟改合同，详细察酌其权限是否分明。经过山西官绅的详细讨论和大学堂学生的“民意测验”，多数人同意合并，沈敦和还提出两校合并后，一部取名中学专斋，一部取名西学专斋。此次中外“归并办理”的交涉，时间长达近两个月。其焦点问题仍在传教及主权等问题。鉴于义和团运动的深刻教训，山西当局坚持教会不得干预学校，禁止在校内宣讲教义；李提摩太则坚持中外条约规定宗教自由，巡抚并无废约的权利。其他涉及主权者如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等都是激烈争论的问题。双方旷日持久，接连交涉，几成僵局。最后，山西官绅在确定“可无牵涉传教之嫌”和“断无主权旁落之嫌”的前提下，终于同意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成立西学专斋。

于是，1902年5月初2（公历6月7日），以山西官绅代表沈敦和、谷如墉为一方，以李提摩太和敦崇礼为另一方，正式签订新合同，即：《关于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的合同》共二十三条（岑春煊光绪28年5月初5日《奏折》），送巡抚盖印立案，呈清政府批准。根据修订的合同规定：中西大学堂改名为西学专斋，归入晋省奏设大学堂办理。西学专斋既议并入大学堂，即系中国国家学堂，按奏定山西大学堂章程办理。原在上海签订的《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即行废止。山西筹出司库平纹银50万两，分作大学堂西学专斋经费，由李提摩太代为经理，以十年为期，扣足十年或未届十年而款项用尽，均作为期满，交由晋省官绅自行经理。在合同中特别强调，西学专斋是山西大学堂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中国所有，一切均须遵照已奏定的山西大学堂章程办理。同时对西学专斋的权限范围、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校舍建筑和图书仪器的购置、延聘教习和挑选学生，也都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合同》签订后，由岑春煊推荐，清廷委派沈敦和为大学堂督办，李提摩太任西斋总理。6月9日，岑春煊下令将太原城内最好的建筑物皇华馆学台衙门作为西斋临时斋舍。6月26日，西斋校舍整理完毕，宣布山西大学堂西斋成立，正式开学。省城重要官员与士绅，中斋教习、学生及95名西斋新生参加了开学典礼。

西斋专教西学，学科分为五门：文学、法律、格致、工程、医学（至辛亥革命前，因经费所限，未开设医学专门、文学专门，开设了法律、格致、矿学、工程专门四门）。各科无中文课本，由教习用英语讲课，译员译成汉语，学生做笔记。

西学专斋归并入山西大学堂内，为日后山西大学理科、工科、医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解决西斋教材问题而专设的上海译书院所译各类教材，许多成为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

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后，山西大学堂的原设部分改为中学专斋，专教中学，由华人负责。中西两斋各招收学生 200 名。两斋学生待遇相同，每人每月发给白银四两。但教学内容和方法不同。辛亥革命前中学专斋，始终未设专门分科，最初只设高等科，课程只有经、史、政、艺四科，教学内容和方法均按令德堂旧制进行，完全和书院一样，因此，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为中斋学生的主要书籍。

山西大学堂成立之初的校址，校本部、中学专斋及两斋学生食宿均临时设在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今太原市文瀛公园内），西学专斋另借皇华馆学台衙门西院的皇华别墅作为临时校址。清政府任命岑春煊为山西大学堂节制，李提摩太为西学专斋节制、总理，沈敦和为督办。李提摩太聘英国人敦崇礼为西斋总教习。西斋教习瑞典人新常富将中、西斋之间，大学堂与巡抚衙门之间装置了斯德哥尔摩产的电话通讯设备。

山西大学堂的成立，不仅开创了山西教育的新纪元，而且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根据 1903 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大学教育共分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通儒院）三级，设立在省会的大学堂，至少需设置三科才能成为大学。1903 年下半年，各省都按章程规定改为高等学堂，全国只有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因与外国人订有合同故仍保留了大学堂名义。同年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后，直到辛亥革命前，全国总共只有以上三所大学堂。山西大学堂中西两斋实行的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两种教育方式，充分反映了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和山西大学“中西会同”的办学特色。

第二节 藏书楼的诞生（1902—1911）

一、藏书楼的起源

作为学堂的重要支持体系，图书馆（时称“大学堂藏书楼”）随学堂同时诞生。山西大学堂自开办之初，就比较注重图书资料的收藏，在《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合同》中，就有建造“藏书楼”等经费支取事项之规定。但创办初期一时尚无固定的场所。山西大学堂藏书的基础是令德堂与晋阳书院的藏书。这两所书院都是省城的大书院，本身有着丰富的藏书。两书院的藏书内容大都是经、史、子、集四部古籍及地方文献，也有一些时务新书。这些图书除政府所颁发的必备书籍外，其余书籍一般由省城的浚文书局刊刻。书院时期，图书的管理和借还由监院官负责。“本院藏皮书籍，诸生阅看时须呈明监院官亲自发给，阅毕呈交监院官亲自收回。不得久假不归，不得折角染污，违者责令诸生赔补”

（《晋政辑要》23 卷，59 页）。可见书院时期藏书楼采用的是闭架式管理。最初的大学堂图书管理也沿袭了此制。图书藏在大学堂临时校址东侧的一座木制小楼内（今太原市图书馆旧址，1982 年拆除）。现在山西大学图书馆还能看到封面有“晋阳三立书院”标签的图书。但由于其后战争年代，图书馆随学校辗转迁徙，绝大多数图书尽皆散失，现在图书馆基本看不到大学堂的藏书了。

二、藏书楼的建设

从体制和名称上看，虽然改为学堂，但是举人和进士的幽灵仍旧盘桓在士人的脑海中，由于学生志在科举，所以学习只重经史考据，四部古籍仍然是学生的主要阅读书籍。大学堂的藏书楼主要还是中斋藏书楼。当时山西印刷业非常落后，只有书业德、书业昌及官办之浚文书局等极少数几家书局，只印官版正字的四书五经之类的图书，书铺也不发达，学生购买书籍非常困难，藏书楼的新书增入也不多，因此，藏书不能满足大学堂尤其是西斋学生的阅读需求。

不过，作为省内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巡抚岑春煊还是非常重视的，他亲自设立章程，制定规划。在1902年2月颁布的《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中，他对学校的未来作出了构想：“此时拟建之讲堂斋舍饭厅操场，以及浴堂药室仪器试验各房、藏书印书等楼局，必须按照后日推广规模建造，方免届时展拓为难。”6月，岑春煊送北京清政府审核之合同中第五条载：西学专斋仪器书籍等项皆系晋省款项所购，应随时立册，登载并盖本斋图记，以便十年后点交。第八条载：今请巡抚勘明地段，动用西学专斋经费洋四万元，以便酌夺建造西学专斋之讲堂、藏书楼、仪器舍、阅报所、试验场、体操场、客厅、司事夫役住房等屋，该各等房屋尚未建造之，先应请巡抚于半月内酌给公所，暂为开办西学专斋之用。

在学堂创建之初，当时的巡抚岑春煊就考虑到了将来要扩大办学规模，拓展校园，可见他是一个有远见和胆识，热心洋务的人，当时有开明官僚之称。他在处理教案问题上，有理有节，使双方均感满意。在对山西大学堂的管理和发展方面都有长远和周详的考虑，可以说他对促进山西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山西大学堂成立之初，为了解决西斋教学所急需的教材和适应当时全国兴办学堂的要求，李提摩太由西斋的经费内每年拨出白银一万两，于1902年8月在上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聘请了当时的中外翻译名流11人担任译员。山西大学堂译书院曾翻译和出版了有关高等、中等以及师范学堂的教学用书和名著共23种。主要有：《迈尔通史》、《最新天文图志》、《最新地文图志》、《欧洲商业史》、《世界故事》、《生理学教科书》等重要著作和算术、代数、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地文学等多种教科书。其中有些为欧美当时出版的新书，如《迈尔通史》为1900年美国新版书，1902年即翻译出版，《最新天文图志》1903年出版，1906年即出版了中译本。这些图书在民国以后，甚至到上世纪40年代仍在被使用。译书院所译的各类教科书，为当时许多院校所采用，对解决学堂缺乏教科书的问题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这些图书亦成为山西大学堂藏书楼的重要藏书，有个别图书保存至今。1908年因西斋开设工程科，添购科学设备，出现经费困难，译书院随即停办。译书院虽然只存在了六年，但为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学术思想作了许多工作，是值得称道的。

三、新馆舍的落成

1902 年秋，山西大学堂于太原侯家巷购得民地二百余亩，由西斋总教士敦崇礼负责动工兴建新校舍。新校园于 1903 年动工兴建，1904 年 8 月落成（今太原师范学院北区所在地），侯家巷新址校舍落成后，中西两斋同时迁入。山西大学堂新建校舍规模宏大，布局整齐，是中西建筑风格融汇的结合体。主要建筑有影壁、牌楼、大门，门内为花园，花园北为当时全省第一座无大梁和支柱的大礼堂（由瑞典人新常富设计），花园西为二十排中、西斋学生宿舍；校园西北为大成殿，西北隅的中式瓦房为中斋教习宿舍，其前面为中斋讲堂。东北隅的新式房屋为西斋教习宿舍，其前面为西斋教室，东边为西斋藏书楼、阅报室、仪器室、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博物院、体育场等。

图书馆，时称“藏书楼”（因为在西斋位置，又由西斋出经费，所以也称“西斋藏书楼”）就坐落在大学堂礼堂后面的一排排房内，共有房屋 11 间，房顶的中部有钟塔（1917 年将图书馆顶部的钟拆下置于新建工科教学大楼的顶层作为钟楼的钟）。这个地方亦是学校之后近 50 年图书馆的馆址。“楼内辟有一室，谓之阅览室”。馆内藏有当时中国新出版的最好的教学参考书，与刚购回的西方文学精品丛书，及李提摩太赠予的一部分英文图书和当时出版的主要中英文杂志报纸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藏书可谓国内上乘。

四、藏书楼的管理

西斋最初由李提摩太聘请英国人敦崇礼（MoirDuncan）做总教习，聘瑞典人新常富（Nystrom）、英国人毕善功（L.R.O.Bevan）等为分教习。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与英国学校相同。这些洋教习在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教学方法引进大学堂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管理思想带入了学校。因此作为西斋一个组成部分的藏书楼已不再雷同于封建社会书院时期以藏为主的藏书之所，它已具有近代图书馆组织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开放型特点，并且成为当时学校一个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的学术交流场所。藏书楼虽主要针对学生开放，但也作为一个教习讲演的场所。每逢讲演的时间，就有一鼓手在藏书楼的右前方击鼓召集听众，这对当时学堂教员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无疑发挥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藏书楼及阅览室面向学生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 8 时至 11 时，下午 2 时至 5 时。据清宣统元年《调查省垣各学堂意见报告——山西大学堂调查意见》载，学堂的管理员“均能热心毅力，认真管理”，设备及簿册方面“设备完全，簿册整齐”（《山西教育官报》第十期，宣统元年三月）。可见当时的图书管理人员非常负责，管理也井然有序。

1904 年，新任学台宝熙对山西大学堂进行整顿。于督办下增设监督，取消总理职位，将总教习和副总教习改称教务长等。特别是根据新学制对中斋的学科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较大改革，高等科改分为一、二两类，第一类以文为主，第二类以理为主，课程增设英文、日文、法文、俄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国文、图画、音乐和体操等许多新学科，对旧课程除保留经学

外，其它科目一律取消。每星期上课二十四堂，上下午各两堂，星期日休息。至此，中西两斋在教学内容上日渐趋同。随着课程的增改，以及中西两斋课程的调整，藏书楼陆续增加了一些有关新学科的图书，如数学、植物学、矿物学、动物学、生理学、法学等，其中包括一些翻译的和原版的西文、日文图书。当时西斋所购图书遵照合同二十三条之规定，都随时立册，登载并盖本斋图记，以便以后点交。再加上大学堂译书院翻译的许多科技图书，大学堂活版部编印的一些讲义、课本，使藏书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为支持以后山西大学文、法、理、工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教学提供了有力的文献保障。

根据《二十三条》合同规定：西学专斋经费，除光绪二十七年付过 10 万两外，光绪二十八年又付银 5 万两作为开办经费。其余 30 万两于光绪二十九年一起，每年付银 5 万两，至光绪三十四年一律付清。又“如未届十年，五十万两之款项用尽，亦即作为期满，交由晋省官绅自行经理。”据此，西斋应提前于宣统元年（1909 年）归还山西自办。于是 1910 年秋，山西巡抚丁宝铨同省咨议长梁善济便电邀李提摩太来并履行前约。是年 11 月上旬，李提摩太到达太原。丁宝铨接受了李提摩太的辞呈，并同意他与西斋教习签订的延聘合同和继续扩充西斋的建议。1911 年 2 月，苏慧廉正式办理了西斋移交的手续。西斋收回自办后进行了改组，但不久武昌起义爆发，11 月太原也随即响应武装起义。由于政局动荡不安，以及校内驻兵，经费无着，只得将教习、学生遣散，学校暂行停顿，藏书楼也封存书籍，关门谢客。在这期间，中斋遭到了乱兵洗劫，而西斋幸得西斋司库高大龄看护，才使藏书楼、实验室等设施得以完好保存。

山西大学堂初创十年间，其藏书的管理，最早由学校管理员兼管，后来设掌书专门管理，先后聘请了石铭、江苏人监生宋兰佩（1904 年到任）、王炳炎（1906 年到任）、潘映衡（兼教务员）、赵城人张尔侯（1911 年到任）和西斋司库高大龄等掌管藏书楼的管理。图书馆历年购书款项向无定额，也不列专项，只是在设备仪器费用中划出一部分用做购书，由于山西地处偏僻，选书非常不易，因此藏书楼科学新书数量的增加十分有限。

第二章 民国时期（1912—1948）

第一节 民国初期缓步发展（1912—1930）

一、山西大学的建立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11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结束。山西于1911年10月29日在太原举行武装起义后，推举阎锡山为大都督。阎锡山先后投靠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并运用权术，排斥异己，把山西变成他封建割据的“独立王国”。因此，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山西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按照北洋军阀政府的规定办理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并成立临时政府。1月3日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1月9日教育部成立。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北洋政府时期开始。蔡元培在不到一年的任期内，制定公布了新的学制系统，颁布了《大学令》，内容包括教育宗旨、分科设置、大学名称、预科、入学资格、学位、校长教职员等共22条，大学教育一步步走向正规。

1912年1月教育部成立后，通告各省各类学校迅速开学，并令“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为校长”。根据《大学令》山西大学堂由此更名为山西大学校。原中、西两斋同时废除，实行大学分科，即工科、理科、文科、法科。学制分本科与预科，本科2至4年，预科3年。课程与授课均按部颁大学规程中有关分科大学之科目课程与周授课学时制定。一学年划为三个学期，即8月1日至12月31日第一学期，1月1日至3月31日第二学期，4月1日至7月31日第三学期，每学年有三个假期，年假12月25日至1月8日、春假4月1日至7日、暑假7月1日至9月10日。原大学堂教职员生此时陆续返回学校。

11月，又按《大学令》成立了校评议委员会与教授会，经两会酝酿讨论，制定并通过了《山西大学校学则》（以下简称《学则》），《学则》是山西大学校在民国期间建立的第一部学校规则，为学校屏除封建学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学制新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学则》分总则、学科、课程、管理规则、教职员权限等114条。其中管理规则中规定了图书及图书室通则、阅览室通则，对图书馆的工作进行了规范。1913年，在实施《学则》过程中，学校又建立了适应新学制的实际运作组织机构：在校长之下分别设学监、庶务二处，每处设主任一人。学监处于主任下设有学监；庶务处于主任下分会计、文牍、出版部、图书馆和杂务五部，各部均由事务员组成。根据民初学制，山西大学取消中、西两斋，设立预科和本科。预科分一二两部，第一部为文法科，第二部为理工科，均修业三年，本科修业四年，本科包括文、法、工三科。

此时图书馆分属庶务处管辖，图书馆从此代替了藏书楼的旧称，图书馆管理

人员则称事务员。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批返校的掌书张尔侯，成为图书馆馆长。

二、山西大学校图书馆的建设

民国时期的最初几年，图书馆的藏书增加不是很快，据 1923 年出版，陈希同著的《山西调查记》记载：1922 年的山西大学图书馆，陈备书籍千余部，供生员阅览。而当年在校学生有 874 人。千余部书籍显然不足以满足需求。但在藏书内容上，却较有特色。因为当时的工科所聘教师大多为留学英、美，学有成就者，所使用的教材或参考书皆系欧美工科教材，并用英文原本进行讲授。为配合教学，图书馆在原藏书基础上，尽可能的搜集与教学相配合的图书。对当时涌现出的各种有关新思潮、新学说的书刊，图书馆都加以搜集。随着法科学、政治学、土木工程学、机械学、采矿学、电气学等学科的开办，又陆续增购了这些新学科的图书。

当时学校各科未设专门的资料室。1920 年 4 月，学校 10 余名教职员、20 余名学生组织成立了以“交换知识、研究学术为宗旨”的新共和学会，持续时间达四年。学会认为学习、科研，图书为第一要务，故成立了图书室。图书室除会员寄存的书刊及全国各大学赠阅的图书杂志外，又从山西省图书馆借来一些书刊进行学术研究。这是学校除图书馆之外的第一个图书室，可视为最早的资料室。后来学会提出建议，希望学校图书馆多买点最新的书籍和杂志，归学会同人管理，并认为图书馆事务可以让学生管理，同时提出向教师借书，和文庙图书馆建立互借关系等。这些管理思想和方式的提出足见山西大学校的学生所接受的西方教育，使其极具参与和民主管理意识，西方近代图书馆管理的理念已深入学生的思想之中。

二十世纪初期正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还是比较重视的。表现在图书馆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法规体系开始建立，图书馆的管理和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首先是图书的使用受到重视，书籍阅览流通工作开始与入藏整理工作得到同等看待，其次是开架阅览逐步推广。1919 年李大钊提出开架阅览，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施行，至 1921 年不少图书馆已部分或全部采取开架阅览的管理方式。

这一时期，山西大学校图书馆的发展与管理可以说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已完全摒弃了旧式藏书楼的管理方法，引进了西方管理方式，采用开架式管理，并编制了卡片式目录，供读者查检。作为主要的教学辅助单位，图书馆在学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山西大学校时期，除了 1917 年将原大礼堂前的花园拆除并修建工科教学大楼外，学校占地面积仍同辛亥革命前，共 209.45 亩。主要建筑有大礼堂、工科教学大楼（主楼）、文科法科教室、图书馆、办公室等房屋 602 间，图书馆是当时学校的主要建筑之一。

山西大学校每年的经费约为银币 15 万元，在设备购置费 30,324 元里包括购买图书的费用，每年购书约 5000 册。截止 1930 年，图书馆共藏中、日、英、法、

德文各类图书 108, 501 册。按 1930 年在校生 923 人计算, 生均年购书量为 5.4 册, 人均藏书 117 册, 藏书量已属相当可观, 应当说基本可以满足教学的需求。

第二节 动荡年代跬步前行 (1931—1938)

一、山西大学的成立

1921 年 7 月, 南京政府公布了《大学组织法》, 8 月, 教育部又公布了《大学规程》, 对大学进行改组。由于当时山西为阎锡山独掌大权, 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重重, 进而形成阎、冯倒蒋的中原混战, 国民政府的政策法规在山西未完全实施。阎、冯倒蒋失败后, 阎锡山暂避大连, 国民政府的政令及各项规章制度才在山西逐步实施。

1931 年 7 月, 遵照教育部颁《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 学校制定了《修正山西大学组织大纲》(15 条), 山西大学校改称山西大学。学校组织机构也进行了改革。文科改为文学院, 原国文学类、英文学类改为国文学系、英文学系, 法科改为法学院, 原法律学门、政治学门改为法律学系、政治学系; 工科改为工学院, 原土木工学门、机械工学门、采矿学门、电器工学门、冶金学门改为土木、机械、采矿、电器、冶金学系。学校行政组织, 在校长以下设: 秘书处、训育处、事务处、图书馆、出版部、注册部、体育部。各机关人选由校长任命, 除设各处、部主任一人外, 另设办事员若干人。图书馆不再隶属庶务处, 而直接对校长负责, 图书馆设主任, 分总务、编纂、阅览三课, 各课设理事。这说明图书馆在学校发挥的作用使其受到了重视, 因而地位得到提高。

1931 年 8 月, 由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各处主任、各学院教授代表组成了校务委员会, 并由王录勋校长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校务委员会, 通过了《山西大学校务会议章程》, 规定每月开常会两次, 由校长召集。8 月间, 校务委员会先后召开了 10 次会议, 通过了山西大学《训育规程》、《注册规则》、《山西大学图书馆办法》等 15 种规章制度。

二、山西大学图书馆的建设

三十年代初期的山西大学对图书馆的建设十分重视, 图书馆主任为校务委员会成员, 图书馆的规章制度一般都要经过学校校务委员会讨论。这一时期先后制定了《山西大学图书馆办法》、《山西大学图书馆暂行办事总则》、《山西大学图书馆阅览室规则》、《山西大学图书馆教职员借书规则》、《山西大学学生借阅图书规则》等五项规定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确定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 进一步规范了图书馆的管理。

《山西大学图书馆暂行办事总则》规定: 图书馆设总务、编纂、阅览三课; 总务课工作为: 馆务会议报告、馆规、文牍、会议及庶务、调查、采购、登录、校抄、装订修补、收藏图书杂志统计、征求交换; 编纂课工作为: 编目、分类; 阅览课工作为: 陈列图书、阅览、图书出借、书库保管共七条。《图书馆办法》共